◆观 点

“政令出海”重在疏通行政经络

4月29日，国务院推出新规，国字头政令文件签发周期不得超过7天，对于符合政府公开信息范围的文件要求签发与公开同日。

政令不畅是一种行政“慢性病”，仅靠精简行政事项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很难达到根治的目的。行政流程繁冗就像病菌一样侵入到行政运行体系的血液中，亟须精细调养进而疏通整个经络。这种精细调养主要体现在标准化、精细化、创新化这“三化”。

首先，行政管理流程标准化将让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减少行政成本的新增量。本次国务院针对内部行政流程的新规，首次精确设定文件签发日期要求，这是治理繁文缛节的一个开端，标志着行政机构改革正在从大刀阔斧走向精耕细作，公共服务标准化是公共治理发展的一个方向。尽管公共事务中有很多难以量化的影响因素，但是量化与标准化并非同义词，标准化更加注重对行政程序的行为规范设定与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考量依据，以此来为新的治理行为建立科学依据。持续的简政放权已经让很多原本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行政职能部门转向了新的公共服务领域，但是出于对新业务的陌生，在文件签发过程中形成了先观望再掂量最后勉强签发的状态。这种行政行为惰性直接转化为影响政策执行效率的行政成本，而这种惰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来相关规定中对文件签发的时间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给懒政留下了可乘之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部门心态根深蒂固。

其次，国字头政令限期7天出“海”体现出的改革底气最终要建立在行政管理精细化的基础上。精确到天数的文件签发要求将倒逼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公共决策机制。面对日新月异的改革环境，决策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政策效果的好坏，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过程，很多企业和老百姓的投资和消费预期需要及时准确地通过公共政策传递出的信号来预判。可以说，政策文件的签发时间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转。如果国字头的文件签发都出现了低效运转，很难想象改革政令下发到地方基层的困难程度，政策传达的“最后一公里”将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也很难得到保障。

最后，严谨的时间期限要求不断创新治理模式，让改革政令通畅。在新规中，不仅规范了文件签发的精确时间期限，更是要求相关部门务必做好政策解释和舆论引导工作，体现出文件限期签发不仅是科学行政的严谨问题，更是一种公共治理艺术的表现。无论是多么科学严谨客观的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公众的理解和信任问题，在大数据与自媒体等新兴传播手段兴盛的当今社会，如果政策部门不能坚持创新出更有效的传播引导方式，即使文件签发与政令传达的速度再快，也是事倍功半。舆论引导是政策意图传播的第一关，也是保障改革血脉通畅的第一步。若想政令出海并且顺利走完政策“最后一公里”，需要创新和建立公众参与式的公共治理模式。

总之，如果说这轮行政改革的前半段我们追求更多的是速度与激情，现在步入改革深水区，我们更要注重速度与质量。打通行政的经络，让各种利国利民的政策红利能够畅通无阻地惠及全社会。大刀阔斧的壮士断腕改革精神，最终要通过精雕细刻一个又一个行政流程和决策环节来进行诠释。（2015年5月4日《经济参考报》刘艳）

准确把握新常态的两个特征

什么是新常态？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有说九个特征，有说四个特征，但是概括起来说，大概是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第二个特征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对于这两个特征，可能没有太大的分歧，学术界也没有很多争论。但是，现在到底是已经转入了新常态呢，还是说正在转？这是有不同认识的。

新常态的这两个特征，转向的进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特征的转向已经是事实了。大概在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地下，从去年的7.4%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这是个事实，现在已经在中高速了。今后有可能还会往下变成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第二个特征，即经济增长方式或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这是一个进行时，并没有完成。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它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的质量。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以至于造成了现在的困境。为什么提了二十年，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关键问题在哪里？根据二十年的经验，我认为就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讲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

在总结“十五”时期的经验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生了逆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最主要的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权力和太多的资源，总想运用权力和投入资源来达到提高GDP增长速度的政绩目标。我们现在讲的好多问题，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技术的创新等，其实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粗放。过去太粗放，现在要集约。

我认为旧的常态已经走到尽头，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太缓慢，贫富分化加剧，一直到宏观经济。实现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转向，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技术的创新、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

怎样才能够实现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的转向？就是切实执行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比如，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期待很久，就是因为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行业国企占主导，它们使用资源效率的情况对整个经济的效率影响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我认为最重要的就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就是要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个管理方法跟原来的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改革，比如说创新领域。我们到现在对技术创新用的办法，基本上是苏联的办法，钱花了很多，但是办法不大对，就是行政主导的办法。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新常态。就是说增速是中高速，甚至是中速这不要紧，只要增长质量提高了，就不会有麻烦。（2015年5月4日《北京日报》吴敬琏）

◆纵 横

俄罗斯民众为何力挺普京

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俄总统普京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有86%的受访者表示对普京的工作满意。这意味着，一些西方媒体对于“2015年普京将下台”的预测颇有些一厢情愿。

在危机面前，俄罗斯人表现得理智而优雅，这源于最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积淀。

俄罗斯人不怕制裁，是有底气的，毕竟其综合国力不可小觑。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最为辽阔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有着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由此看，西方的制裁手段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扼住小国咽喉，却难损俄罗斯的元气。当然，更不用说，在现如今这个国与国高度依赖的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制裁很可能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没有纠结。只不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长期以来，俄罗斯人处于尴尬之中，在东西方世界均找不到归属感。在东方人看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欧洲，理应是个西方国家；而在欧洲人眼中，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并且缺席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了欧洲历史进程的大事，难道不是个异类吗？

鉴于此，俄罗斯的民族性也是复杂而分裂的，一方面热切希望“回归欧洲”，另一方面洗刷不掉东方文化的烙印，使之一直在东西方两个阵营中摇摆，既向往自由，又崇拜领袖，既尝试特立独行，又忽视不了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俄罗斯人享受着绝世的辉煌，也承受着绝世的孤独。这便不难理解，他们在对抗强敌时，为什么会更加坚定地维护和捍卫领袖。（2015年第7期《环球》刘莉莉）

◆史海钩沉

明末贪官奇葩的事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啊，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他绝望了。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喻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

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个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即将陷落之前的3月6日，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3月15日——城破前3天——办理交割。

赵士锦后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满朝文武心照不宣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葩，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他们也哭穷。似乎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3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铁公鸡”们的下场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史载，闯王大军围城之时，京城守军倒卧城头，“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损失多少?从数千万到上亿，不同的统计，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血泪悲剧。

一个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遇事谁也不肯担责任，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一味指责对方，势必最后同归于尽。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

但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噩运的开始。他被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5天5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陈演，哭穷的大明重臣，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2015年3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关山远）

◆评 论

“约谈十条”约束的不只是互联网

继“微信十条”“昵称十条”后，国家网信办再推“约谈十条”。这个规定自6月1日起实施。针对外界关心的内容，“约谈十条”划定了实施约谈的具体情况，对互联网信息管理、服务单位进行“软约束”。

学生时代，最令人惶恐的事情莫过于“叫家长”，即使是那些顽劣的孩子，经此“一役”，多少也会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在行政管理领域，“约谈”的作用颇有些近似于“叫家长”——部门工作不力，甚或存在违规之举，通过“约谈”其负责人，可以敦促整改、强化内部管理。条分缕析的“约谈十条”，约束的显然不只是互联网企业，以秩序维护者姿态出现的网信部门，亦在清晰有力的约束范围之内。

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任何空间与领域都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当然概莫能外。一方面，网络要在法律空间内健康运行；另一方面，针对互联网的监督管理亦应在制度框架内进行。通过明确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机制，不仅可以涤荡网络污垢，同时也为推动约谈进一步程序化和规范化建制立规。

实际上，在管理领域，类似“约谈”并不鲜见。今年2月2日和4月10日，国家网信办就先后约谈网易和新浪，引发广泛关注，“约谈”随之成为互联网业界热词。国家网信办约谈的效果有目共睹。尽管效果显著，但在以往的约谈过程中，公众看到的只是约谈结果，为什么约谈、谁来谈、谈什么、谈完之后怎么办，这些核心内容却付之阙如。显而易见，这正是此番“约谈十条”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约谈十条”无异于一份网信部门的权力清单，对照这份清单，互联网企业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边界，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而不必因担心误触“雷区”惴惴不安。对于网络管理者而言，兼具沟通、惩戒与监督作用的“约谈十条”，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权力在约谈过程中“任性”——与常态化约谈一同到来的，是约谈本身更加规范透明，违规者因此心服口服，管理者因此依法行政，旁观者则因此作出监督。这样的管理体系，能够有效保证在强化网络监管的同时，不至于因权力边界模糊而影响互联网的创造性与自由性。

身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空间。无论“微信十条”“昵称十条”，还是“约谈十条”，新规频出的背后，是网络空间正在得到更大的重视。对于一项产业来说，只有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才能保障持续健康发展；对于行业秩序维护者而言，明确自身行为边界，正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题中应有之义。（2015年5月1日《新民晚报》赵志疆）

◆文 坛

知足与惜福

周末与朋友逛夜市，看见地摊上摆着这样一件工艺品：大大的脚背上，伏着一只小小的蝉。摊主见我们感兴趣，就过来说，这是取“知了”和“足”的形音，寓“知足”之意。无独有偶，前不久到市里的廉政教育基地参观，教育基地紧挨着一处监狱，这边是展览大厅，那边就是森严的高墙。凑巧的是，监狱所在地小镇的名字叫“惜福”。

知足，惜福，两相鉴照，令人感喟。

人心最难在知足。有一首《解人颐》的诗，对人性中的贪欲作了入骨三分的刻画，诗中说，“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最后发出了“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的感叹。

凡事都有两面性。抛开消极的一面来看，不知足，不满足，永不停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文明进步的追求，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知足与不知足，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看对什么知足，对什么不知足。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水火无情但无罪，罪在不知足、不惜福的心，在于无底线、少敬畏、不去遏制人的非分之欲。看看史册中的贪官污吏，审视现实中的“老虎”“苍蝇”，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他们所拥有的俸禄薪酬以及合法享有的相关待遇等，满足其正常的生活需求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些身居高位者来说，更是无须为“稻粱”而忧的了。（2015年4月16日《光明日报》文黎）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010）62809949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6228 62805368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